Globethics Repository



基督宗教與民族主義——神學論題引介 [Introduction to the Main Theme*]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ZHAO, Lin;TANG, Edmond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11-05 23:22:57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4522

基督宗教與民族主義

——神學論題引介

趙林　鄧守成
主題策劃

當圖拉真（Trajan，西元 98-117 年的羅馬皇帝）時代的羅馬人以豪邁的口吻宣稱「條條大路通羅馬」時，整個西方世界只有一個國家，那就是羅馬帝國。羅馬帝國建立在強制的基礎上，它是地中海周邊地區各個不同的種族群落、宗教信仰、語言文化的大雜燴，完全靠暴戾的武力和剛性的法律來加以維繫。到了西元五世紀日爾曼蠻族摧毀西羅馬帝國之後，在逐漸形成封建制度的歐洲大地上，又出現了多如牛毛的諸侯采邑和騎士領地。這些中世紀的王朝國家只是封建領主的私有之物，其邊界和領土隨着王室之間的聯姻、繼承制度而不斷改變，與居住在土地上的普通民眾毫無關係，也不存在甚麼民族自決和主權觀念。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是在中世紀晚期才初現端倪的，而十六世紀發生的宗教改革運動極大地促進了現代民族國家的生長。從根源上來說，西方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都與宗教因素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基督宗教不僅對西方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而且也伴隨着近幾百年來的全球化浪潮在東方土地上結出了碩果。它一方面在不斷適應東方文化環境的情況下逐漸推進自身的本土化建設，另一方面也與後殖民時

代東方國家中普遍高漲的民族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形成了巨大的張力。如果說基督宗教在深受西方化影響的拉丁美洲和非洲——這兩個地區尚處於蠻荒狀態時就已經淪為西方的殖民地了——獲得了迅猛發展，[1]那麼它在文明根基深厚的亞洲則面臨着傳統文化復興和民族主義高漲的嚴峻挑戰。基督宗教無疑曾經成功地推動了西方現代民族國家的崛起，但是在東方現代民族國家振興的過程中，它到底將會扮演一個同舟共濟的參與者，還是一個格格不入的陌路人，至今仍然是一個難解之謎。

正視當前中國的大國意識覺醒、民族主義高漲的現實狀況，並且探索一條基督宗教在此語境下的本土化路徑，這是漢語神學不可迴避的時代使命。本期《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推出以「基督宗教與民族主義」為主題的一組文章，旨在通過考察基督宗教對西方現代民族國家崛起的深刻影響及其在東方國家中的現實處境，以說明基督宗教與民族主義之間的複雜關係。並期望能夠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在關注基督宗教發展前景和中國社會現實的人們心中引發更加深入的文化思考。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趙林教授的〈宗教改革運動與西歐現代民族國家的崛起〉一文，從宏觀視野考察了十六世紀宗教改革運動對於西歐現代民族國家崛起的重要促進作用。文章在概覽了西歐社會聚散分合態勢和中世紀教俗之爭的歷史背景之後，簡要而深刻地論述了西歐主要國家在宗教改革時代發展變化的複雜歷程。趙教授在文中具體分析了路德宗的民族教會和加爾文宗的「兩個國度」思想對

1. 美國賓夕法利亞州立大學（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的歷史學家詹金斯（Philip Jenkins）在《下一個基督王國：基督宗教全球化的來臨》（*The Next Christendom: 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中提出了「上帝在南下」的觀點，他認為二十世紀的一個重大事件就是基督宗教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爆炸性擴張。

於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諸國、尼德蘭、蘇格蘭等地民族國家形成和發展所產生的巨大影響，闡釋了英國國教會（聖公會）與天主教會以及清教徒之間的複雜矛盾以及由此引發的政治革命，而且也對天主教在西班牙和法蘭西這兩個歐洲大國中與政治的不同關係模式及其歷史後果進行了對比性研究。文章最後簡述了處於嚴重分裂狀態中的意大利和德意志在宗教改革時期的悲劇命運，並且對宗教改革運動和反宗教改革運動對於近代西歐國家興衰所產生的影響總結出三點結論。

地處伊比利亞半島西南端、最早發起近代海外擴張和殖民貿易的葡萄牙是趙林教授文章中唯一遺漏的西歐重要國家，而這個缺憾被上海師範大學哲學學院的顧衛民教授所彌補。顧教授的〈十六至十七世紀葡萄牙海外擴張中的塞巴斯蒂安主義、彌賽亞主義以及民族主義〉探討了一個對於國內研究者說比較陌生的人物和問題。該文從十六世紀下半葉葡萄牙國王塞巴斯蒂安（Dom Sebastian）的十字軍理想和北非遠征及失蹤經歷入手，詳盡論述了彌賽亞式的塞巴斯蒂安主義（即對塞巴斯蒂安再現和領導人民復國的信念）是如何深刻影響了葡西合併時期（1580-1640 年）葡萄牙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十七世紀以後葡萄牙人建立在上帝特選意識之上的民族精神，以及葡萄牙文學中廣泛流行的「薩烏達德」（Saudade）觀念（一種戀舊思鄉和渴望美好事物的憂鬱情結）。顧教授在文章結語中強調，在歐洲各國中，葡萄牙人的民族意識是最早覺醒的，而具有彌賽亞主義特點的塞巴斯蒂安主義則極大地強化了以基督宗教信仰為核心價值和靈魂的葡萄牙民族精神。

與趙、顧兩位教授的文章相呼應，首都師範大學比較文學系的林精華教授在〈俄國東正教與俄羅斯民族主義的

形成和發展〉中考察了俄國東正教對於塑造以「莫斯科－第三羅馬」為基本理念的俄羅斯民族主義的重要作用。林教授在文中指出，自從一五一〇年俄羅斯修道院長費洛菲（Philotheus）提出「莫斯科－第三羅馬」的概念之後，俄國東正教就成為俄羅斯帝國發展的重要精神。到了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時代及以後，俄國的統治者們更是自覺地運用東正教來加強國家實力和民族意識，把俄羅斯神化為世界上最偉大的祖國，形成了「俄羅斯祖國」和「人民」等概念。在十九世紀的俄國知識分子中，逐漸培養了一種將愛祖國與愛上帝相聯繫的精神特徵，並且在俄國文學中充分表現出來。這種通過東正教信仰來強化甚至神化俄羅斯國家的歷史傳統，雖然在蘇聯時期受到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抑制，但是在蘇聯瓦解之後的俄羅斯又東山再起，俄國東正教至今仍然是俄羅斯帝國觀念和民族主義長盛不衰的重要精神資源。

與上面三位教授探討基督宗教與歐洲民族主義之關係的視角不同，英國伯明瀚大學的鄧守成教授和中國人民大學的何光滬教授把關注焦點集中於東亞社會。鄧守成教授的〈東亞——國家、民族與處境神學〉從近百年來亞洲地區應對西方文化挑戰而採取的變革入手，對亞洲政治世俗化過程的階段性特點進行了說明，揭示了當代亞洲政治生活中國家與宗教的互動關係。鄧教授對東亞地區的三個主要國家中國、日本、韓國的情況進行了重點探討，分析了以趙紫宸、吳耀宗、丁光訓為代表的中國處境神學的發展路向，展現了日本基督教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對軍國主義的屈從以及戰後的深刻反省，闡述了韓國「民眾神學」的概念內涵、發展歷程、社會作用及其與韓國傳統宗教信仰（尤其是薩滿教）之間的文化聯繫，並對基督宗教在東

亞民族國家發展過程中的歷史作用作出了精闢的總結。

著名宗教學專家何光滬教授的〈龍與鴿子——中國的民族－國權主義與天主－基督宗教〉是一篇具有深刻思想內涵的學術論文。該文首先對中國歷史文化語境中的民族主義與國權主義的關係進行了辨析，說明自先秦至當代，國權主義觀念已經滲入並主導了民族主義觀念，形成了一種「民族－國權主義」，其象徵就是「龍」的符號。何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龍」在中國歷史中從來就不是人民的象徵，而是皇帝的象徵。文章的第二部分對基督宗教與中國民族主義和國權主義的關係進行了梳理，認為基督宗教在中國一千多年的起落興衰都與國權主義的影響有關，基督宗教的對立面並非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而是國權主義。基督宗教就如同一隻馴良的鴿子，它與兇惡的龍之間存在着巨大的差異，而鴿子溫良和平的性情同樣也是推崇「和諧」理念的中國人的民族性格的典型特徵。因此，鴿子比龍更應該成為中國人民的文化象徵。

以上五篇論文從西歐到東歐，再到東亞和中國，較為全面地展現了近代以來基督宗教與民族主義、靈魂的國度（教會）與世俗的國度（國家）之間的互動關係。五位作者各自選擇的研究進路互不相同，但是五篇論文卻構成了一個彼此呼應、和諧有序的整體。這種圓滿的結果對於組稿者和寫作者來說都是不期而至的，它或許可以看作是聖靈工作的一種神奇效應吧！

作者電郵地址：zhaolin1954@163.com（趙林）
e.s.tang@bham.ac.uk（鄧守成）